

鲁迅

鲁迅晚年情怀

王彬彬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鲁迅

鲁迅晚年情怀

王彬彬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晚年情怀/王彬彬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3163-7

I. ①鲁… II. ①王… III. ①鲁迅(1881~1936)-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6944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封面装帧 傅惟本

鲁迅晚年情怀

王彬彬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25 插页 5 字数 141,000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163-7/I·1419

定价 36.00 元

修订说明

199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文化名人与上海”丛书,本书是其中的一种。

记得是1997年春节后动笔,以几个月的时间把这本小书写完。那年我35岁,思想上比今天更为幼稚,学识上比今天更为浅薄,评鹭历史、月旦人物,比今天更没有分寸,所以,这本35岁时写的书中,乖舛、荒谬之处,是并非个别的。这一次,我以救活这本小书的心情对它进行了修订。修订之处是颇不少的。特别要交待的,是原书的第四章《脊梁与箴片》几乎整体地删除了,只保留了最后一节“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即便是这一节,也删掉不少。原来的第四章,主要是论述鲁迅与以胡适为代表的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而对胡适们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甚至不无漫骂之语。这充分显示了我那时的浅陋、糊涂。五年后的2003年,我发表了《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一文,从政治观念、政治立场的角度对鲁迅与胡适做了比较。我自以为这篇文章的立论较为公允,现在以这篇《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替换原来的第四章。

除了第四章等于重写,其他地方的修订,主要是删。删掉了不少我现在认为是不正确、不妥当的文字。但并没有删干净。有的地方,无法进行个别字句的删除。要表达我现在的看法,必须整章整节地重写。但出版社催稿甚急,重写似乎不可能。所以,有些我现在不满意的地方,只得仍旧保留着。

所谓以修订的方式将这本小书救活,并非说修订后的书就有了了不得的价值,而是说,书中对鲁迅的某些看法,例如“姑活心态”,例如“启蒙即救亡”的思想,例如“政治怀疑主义”,例如“多少话,欲说还休”,对于人们理解鲁迅,或许多少起一点参考作用。

书中鲁迅原文引用较多,大都在行文中说明了文章题目和写作日期。其他著作,引述较少,也尽量在行文中指出了作者和书名或文章题目。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收录了较多的鲁迅于上海时期的资料。在写作本书时,大大借助了这本资料集,有些观点,则是转引自该书,在此再次说明。

2015年6月23日夜于南京仙林和园

目 录

修订说明	1
------	---

第一章 逆旅中的姑活	1
“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	4
“就姑且活下去吧”	15
第二章 刀丛荆榛中的恶战苦斗	27
“国民党何尝不想逮捕我,杀害我”	28
“骂鲁迅是‘公事’”	37
“杀人不见血的武器”	44
第三章 启蒙即救亡	52
“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	53
“可羞甚于陨亡”	67
“甘为泥土”	70
第四章 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	83
“做戏的虚无党”与“要一个政府”	87
“试看最后到底是谁灭亡”与“救得一弊是一利”	92
“最好闭嘴”与“想想国家的重要问题”	97
“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	106
第五章 “没齿无怨言”与“一个都不宽恕”	117
“赤条条地站出来几句真话就够了!”	118

“砭锢弊常取类型”与“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	124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与“说婊子是婊子,就不是骂”	131
“有热烈的好恶”与“只能令人变小”	137
第六章 多少话,欲说还休	146
“在悲愤中沉静”	147
“其实我何尝坦白”	153
“我的顾忌并不少”	159
第七章 临终情怀	171
“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讲人话罢!”	172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	177
“都和我有关”	184

后记	190
----	-----

第一章 逆旅中的姑活

秋天的北京，不管人间的世界怎样云谲波诡、血雨腥风，空中，却总有一轮艳阳在高照。1926年8月26日这一天，也是如此。下午4时25分，鲁迅乘坐火车，告别了这座古城。同行者有许广平。自1912年5月起，鲁迅便一直生活在这里，但此刻，他却不得不离它而去。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多次流露出对这座北国大城的怀恋，但他再也不能回到这里定居，只能作为匆匆过客，有过两次短暂的逗留。

他此行的目的地，是远在南国海边的厦门。

鲁迅为什么要离京南下，简要说来，原因大概有这样几种：

（一）“五四”运动以后，北京的新文化阵营发生分化。原来同一步调的“战友”，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转向，有的颓唐。鲁迅觉得自己“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鲁迅题《彷徨》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便是当时孤寂心态的写照。同时，北洋政府也加紧了对文化界的控驭、统制，言论的自由度日见其小。这使鲁迅感到北京成了“沙漠”，“没有花，没有诗”。而这时，南方则显得更有生机和活力，遂使鲁迅对南方心生向往。

（二）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和抨击军阀政府，于是自身也就难免陷入险境。惨案过后，段祺瑞政府通缉5名所谓“暴徒领袖”，之后，《京报》又传出一张被通缉者名单，鲁迅名列其中。在友人的关心和敦促下，鲁迅于

1926年3月26日离开寓所，避居莽原社、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地。此种境遇，也使他考虑离京的问题。

(三) 鲁迅之所以不得不离开北京，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1925年10月，鲁迅已与许广平“定情”。而要“终成眷属”，也必须“走异路，逃异地”。在北京，鲁迅是无法与许广平生活在一起的。在使得鲁迅离开北京而去往南方的诸种原因中，与许广平的“定情”应该是最重要的一种。

以上几种推力，终于在1926年8月26日这一天，把鲁迅推上了南下的列车。



鲁迅先生在上海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1936年10月8日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上海毕竟是上海,三天两头阴雨。1926年8月29日这一天,天气先是阴沉,午后还下起了大雨。鲁迅在这一天抵达上海。次日晚,郑振铎在消闲别墅宴请鲁迅,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周建人等人。

鲁迅在上海短暂停留后,于9月1日夜登上往厦门的海轮。当时,他没有料到,仅仅一年多以后,又会回到这座长江入海口边的城市,回到这他并不喜欢的“洋场”,在这里度过自己的晚年岁月,并且永久地安息在这里。

鲁迅原打算在厦门“休整”两年,再作他计,但结果只呆了四个多月。其原因,一是鲁迅很快发现厦门这地方,骨子里也和北京一样,“死气沉沉”;其次,鲁迅任教的厦门大学也乌烟瘴气,一些素为鲁迅所厌恶的“现代评论派”人物也来到厦大,使鲁迅觉得此处难以久留。在1926年10月23日致许广平信中,他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吗?”厦门与北京同样的“不干净”,终于使鲁迅决定远离。

鲁迅于1927年1月离开厦门到达广州。但广州也非久留之地。鲁迅在广州,也只呆了八个多月。他到广州后,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在上海开始“清党”,捕杀共产党人,4月15日,广州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中山大学也有学生被捕。为营救被捕学生,鲁迅与校方尖锐冲突。本来,由于又有令鲁迅闻其名而皱眉的“现代评论派”人物来到中大,已使他心生去意,现在又加上时局的剧变,鲁迅便毫不犹豫地辞去了在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

1927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登上海轮,前往上海。

“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

有的鲁迅传记中，在写到鲁迅离粤赴沪时，用“开阔爽朗”、“精神抖擞”一类词形容他当时的精神状态，而之所以如此，则因为鲁迅觉得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我想，鲁迅当时的精神状态，恐怕并不如此昂扬、乐观，毋宁说，更多的是阴郁、忧愤和焦虑。鲁迅在那时，的确有着一种对所谓“大时代”的预感，但鲁迅预感到的“大时代”，并不必然意味着新生，也可以意味着更彻底的沉沦和死亡。到上海后不久，鲁迅在《〈尘影〉题辞》中说过这样的话：“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

又有人说，鲁迅当时离粤赴沪，是文化鲲鹏“择木而栖”，“最后选择了上海，在那里筑巢”。这种说法也颇不合于实情。鲁迅虽然在上海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但他却从未积极主动地“选择上海”。在当时的情形下，鲁迅来到上海，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怀着些惴惴不安，心神不宁地登上上海的码头的。对厦门和广州感到失望后，鲁迅并没有在上海长住的打算。许广平后来在《景云深处是吾家》一文中回忆说：“鲁迅在广东遭遇 1927 年的‘清党’之后，惊魂甫定，来到了上海，心里是走着瞧，原没有定居下来的念头的，因自厦门到广州，他如处于惊涛骇浪之中，原不敢设想久居的。所以购置家具，每人仅止一床、一桌、二椅等便算足备了。”所以，鲁迅是怀着一种漂泊感踏上上海滩的。

本来，以当时中国之大，也并没有一处地方是鲁迅既能够又乐意居住的。对于鲁迅来说，黑暗和压迫、荒谬和无聊、污浊和

血腥、腐朽和没落，是到处都一样的。所以，并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令鲁迅在身心两方面都感到习惯、舒适。现在想来，这倒是正常的。如果不这样，倒有些难以理喻；如果不这样，中国也就不是中国，而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因此，当我想象着鲁迅离粤赴沪的精神状态时，我的眼前出现的是《野草·过客》中过客的身影：“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而“东，是几株杂树和瓦砾；西，是荒凉破败的丛葬；其间有一条似路非路的痕迹……”我想，鲁迅离粤赴沪，在他看来，路上的也正是一条“似路非路”的路。当我想象着当时的情景时，当然还有“过客”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那不行！我只得走。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然而，究竟要到哪里去呢？“但是，我不知道。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而那边“是荒凉破败的丛葬”。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鲁迅从北京到厦门再到广州，“拣尽寒枝不肯栖”，但最终却不得不在上海滩上栖息下来，并从这里走向了“坟”。但栖息下来的，仅只是身而已，至于心，则直到生命之火熄灭，也未曾安顿下来过。初来上海时，鲁迅固然有一种漂泊感，一种视上海为逆旅的心态。但实际上，这种漂泊感，这种逆旅心态，直至生命终结，也并未改变过。鲁迅是怀着在上海“过一天算一天”的心情，在上海过到了死亡降临的。

一个人对当下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心态，是感到满意并准备长久保持下去，还是深感不满并随时打算改变；一个人对眼下栖身的地方怀着怎样的感情，是感到习惯甚至喜欢并准备在此安

身立命，还是感到不适甚至厌恶并时刻打算离去——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他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方式。而那种始终怀有的漂泊感，那种一直存在着的逆旅心态，对鲁迅晚年在上海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方式无疑也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至于鲁迅为何始终不能在当时的上海安下心来，当然有一些具体的原因。

从地域上说，鲁迅本就不喜南方而更爱北国。鲁迅虽生长于越地，但却更喜北国风光的辽阔和峻伟。这与鲁迅的精神气质是相符的。即使北方的严寒，也寒得大气、明快，不像南方的冷，阴丝丝、鬼戚戚。对于江南的纤细、精巧、柔弱，鲁迅是颇有些排斥的。在1935年9月1日致萧军的信中，他曾说：“满洲人住江南二百年，便连马也不会骑了，整天坐茶馆。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听到苏州话，就令人肉麻。此种言语，将来必须下令禁止。”作为一个南方人，对江南的风物和人情都如此不能亲近，也很能见出鲁迅的特异。有趣的是这里对苏州话的议论。因为是好友之间的通信，说话很随便，“禁止”云云，自然是笑谈。鲁迅当然不会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但玩笑后面，却有着鲁迅真实的好恶。读过《野草》的人，当会记得其中的一篇《雪》，将“江南的雪”与“朔方的雪”作了比较。“江南的雪”虽然也被写得美丽和极富诗意，但鲁迅显然更爱“朔方的雪”：

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他们决不粘连，撒在屋上，地上，枯草上，就是这样。……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烂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在无边的旷野上，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

的是雨的精魂……

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这是在写雪，但更是在写人，是在写一种精神气质，是在写精神的大飞扬、灵魂的大升华。鲁迅蛰居沪上时，每到冬日，当深夜里坐在灯下、坐在南方的阴冷中时，一定会深深怀念北方的“孤独的雪”，怀念那漫天飞扬的“雨的精魂”，而这时，北归的欲望一定会在心中抬起头来。蛰居沪上的鲁迅，像一株寒带植物，被移栽到了上海滩上，时时感到烦躁、郁闷。

在江南地带，鲁迅尤其不喜欢当时被称做“洋场”的上海。洋人的耀武扬威，国人的卑琐势利，商人气息的浓烈滞重，都是与鲁迅的精神气质格格不入的。就是当时上海街道的狭窄弯曲，也令鲁迅时时怀恋当时北京的空旷宽阔。

当时上海文坛的状况，也令鲁迅厌恶不已。其时沪上文界，正如政界、商界、教育界一样，是鱼龙混杂之地。有许多想以文谋生者从全国各地汇聚到上海，其中固不乏端正优秀之士，在上海诚实地从事文化工作，但也有不少原本便是流氓恶棍无赖的人，混迹于上海文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手段卑劣至极。在1934年12月26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曾说：“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性命……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其实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坏种多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

鲁迅对当时上海不能有亲近之感，心理上始终把这里当作暂居之地，也与在上海期间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经验有关。鲁迅在上海期间，搬过三次家，有时便是因为与邻里不能相安，“惹不

起躲得起”地逃离的。许广平在《景云深处是吾家》中，曾这样回忆住在景云里 23 号的情形：

不料有一天，忽然砰砰枪声接连不断。我们只好蜷居斗室，听候究竟。事后了解，才晓得有一“肉票”，被关在弄内，后为警察发觉，绑匪企图抵抗，就窜到汽车房的平台上，作居高临下的射击。在射击时，流弹还打穿二十三号的一扇玻璃窗，圆圆的一个小洞，煞是厉害。结果自然是警察得胜，绑匪陈尸阳台，可见当时景云里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鲁迅也未能安居，住在景云里二弄二十三号时，隔邻大兴坊，北面直通宝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戏的，有吵架的，声喧嘈闹，颇以为苦。加之隔邻住户，平时搓麻将的声音，每每于兴发时，把牌重重敲在红木桌面上。静夜深思，被这意外的惊堂木式的敲击声和高声狂笑所纷扰，辄使鲁迅掷笔长叹，无可奈何。尤其可厌的是在夏天，这些高邻要乘凉，而牌兴大发，于是径直把桌子搬到石库门内，迫使鲁迅竟夜听他们的拍拍之声，真是苦不堪言的了……我们的后门，紧对着一位鼎鼎大名的奚亚夫，挂有大律师的招牌。他家中有一十四五岁的顽童，我们通常走前门，哪里招惹着他们呢？但因早晚在厨房煮饭，并带领建人先生的小孩，因此被顽童无事生非地乘煮食时丢进石头、沙泥，影响到小孩的安全和食物的清洁。鲁迅几经忍耐，才不得已地向之婉言。不料律师家的气焰更甚，顽童在二十三号后门上做那时上海流氓最可鄙的行为：画白粉笔的大乌龟，并向我们的后门撒尿。理论既不生效，控告岂是律师之敌，这时，刚好弄内十八号有空屋，于是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九日移居到十八号内……古人云择邻相处，但当时的上海，无论如何择法，也

很难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是一段惨痛的回忆。

许多年后，许广平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用了“惨痛”这样的字眼，可见这种事对鲁迅和许广平来说，并非小事一桩。后来，鲁迅不止一次地把上海文场上某些人的做法与顽童的恶作剧联系起来，指出文场上这类人的伎俩，与用粉笔在人背上画一个大白乌龟如出一辙。在《且介亭杂文》中，收有一篇《阿金》，表达的是居住环境恶劣的苦恼，也是对阿金这类声称“弗（勿）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的人的解剖。

于生存之地感到极不习惯，时时想离去但却终于迈不开腿，避之惟恐不及但却又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在这样的环境中苦捱着，自然总有一种烦闷、焦躁笼罩在心头。在上海期间，鲁迅在与友人通信时，不断地提到对上海文坛的厌恶和想换一处地方的打算。这里随意择几处，抄录下来：

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

1932年7月8日致黎烈文：“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

1932年11月20日回京探母期间致许广平：“我到此后，紫佩、静农、寄野、建功、兼士、幼鱼，皆待我甚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

1934年4月9日致姚克：“但上海真是是非蜂起之乡，混迹其间，如在洪炉上面，能躁而不能静，颇欲易地，静养若干时，然竟想不出一个适宜之处，不过无论如何，此事终当了之。”

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我也时时感到寂寞，常常想改掉文学买卖，不做了，并且离开上海。”

直到1936年8月13日致沈雁冰信中，鲁迅还在说：“我看住在上海，总是不好的。”而此时，离他辞别人间只有两个月了。说鲁迅始终未能在上海安下心来，始终有着一一种漂泊感，始终怀着一种逆旅心态，是恰如其分的。

这种逆旅心态，必然伴随着烦躁。这样一种心态，决定着鲁迅的工作方式只能是“打杂”，不能静下心来构思、营造大部头的著作，也难以进行纯粹的艺术创作。很有一些人为鲁迅在上海期间把生命和才华消耗在“琐屑”的文笔上而遗憾，他们认为，在上海期间的鲁迅，人生经验已极丰富，思想也趋于成熟，应该少问世事，不管文坛是非，精心写出几部“大书”，这样鲁迅便有价值得多。这种遗憾是否有理，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理，姑且不论。这里只想指出，当时要鲁迅沉静下来，忘情地倾吐自己全部的思想、情感，其实是不可能的。这不可能的原因有多种，也还有比逆旅心态更深刻的原因。但那种漂泊感，那种逆旅心态，那种因生存环境不适而生的烦躁不安，却也是令鲁迅不能静心撰写大部头著作的一种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既然抱着在这里“过一天算一天”的打算，又怎能着手一种大的工作计划呢？所以在写作上，也就自然有一种写一篇算一篇的心态。

居沪期间，在与友人通信时，鲁迅常用“打杂”来形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时而写杂文，时而弄翻译，还要为别人看稿、校对和帮人介绍稿子，使鲁迅“颇以为苦”。烦躁的逆旅心态使鲁迅只能采取“打杂”的工作方式，而“打杂”的工作方式又使鲁迅更烦躁。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状况，鲁迅时时在通信中流露出。1933年10月27日致郑振铎信中，鲁迅说自己“居此五年，亦自觉心粗气浮，颇难救药”。1935年7月29日致萧军信